

本书第一版获第五届全国图书奖

Xin
Zhongguo
Jingji
Shi

新中国 经济史

苏
星◎著

(修订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in Zhongguo Jingji Shi

新中国经济史

苏星◎著

(修订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The Central Party School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经济史 (修订本) / 苏星著. —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7. 8

ISBN 978-7-5035-3697-7

I. 新… II. 苏… III. 经济史-中国-现代 IV. F12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68965 号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大有庄 100 号

电话: (010) 62805800 (办公室) (010) 62805818 (发行部)

邮编: 100091 网址: www.dxcbs.net

新华书店经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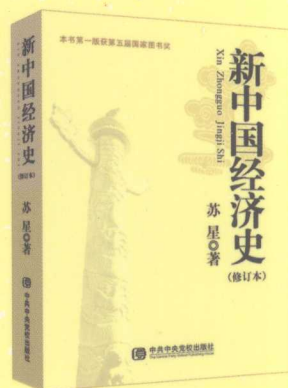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装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40.5

字数: 545 千字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68.00 元





作者近照

作者简介

苏星 1926年2月15日生于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汉族。1948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政治系。1950年至195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1956年晋升为副教授，曾任政治经济学教研室主任。1959年至1961年任中共北京市委《前线》杂志编辑部副主任。1961年至1966年任《红旗》杂志经济组组长。“文化大革命”期间停职。1979年任《红旗》杂志经济部主任，1982年任副总编辑。1988年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兼《求是》杂志总编辑。1989年至1998年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常务委员。作者长期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主要著作有：《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城市住宅问题》、《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苏星自选集》。

责任编辑 朱晋平
封面设计 任燕飞
版式设计 李 灵
责任校对 王洪霞

积之四十年

——《新中国经济史》出版

《新中国经济史》于1999年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庆。

写这本书，酝酿的时间很长。从积累资料、参加各种会议、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专题写作到集中精力成书，大约花了40年的时间。

资料积累，从1956年就开始了。这一年，为准备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从中国人民大学借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为写书作准备。由于光远主持，在中宣部召集双周经济座谈会，讨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和实际问题。参加座谈会的主要是一些老经济学家，有薛暮桥、骆耕漠、黄松龄、宋平、张锡昌、曾凌、王学明等。每次座谈会都印发一份记录，可惜没有保存下来。

我保留下来的资料有：195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为结合实际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请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专家编写的我国建国初期国民经济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资料；1956年夏，教科书编写组邀请经济学家座谈的记录。保存下来的有张锡昌谈商业问题和曾凌谈银行问题的记录；1960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国家统计局和有关部门编写的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经济资料；1963年社会主义再生产座谈会印发的资料。这些资料一直保存在我手边，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机关带到“五七干校”，又从干校带回机关，终于保存下来了。在写完《新中国经济史》以后，由杨秋宝帮我编了一本《新中国经济史资料选编》，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对我编写经济史最有启发的，是参加两次重要的会。

一个是1961年10月至12月，陈云召开的煤炭座谈会和钢铁座谈会。通过这个会使我三年“大跃进”的问题和调整的必要性有了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在这两个会上我作了详细记录。“文化大革命”初期，被红旗杂志社“文革小组”收走，后期又退给我。2005年用《调查研究的典范——1961年陈云召开的煤炭、钢铁座谈会记录》为书名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一个是1988年六七月间，为准备写《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在中南海召集三次座谈会，请薛暮桥等做过经济领导工作的同志参加，专门谈建国以后到“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经济问题。我被特约旁听。下面是我作的简单记录。

6月22日，薛暮桥发言，他说：1947年，中央指定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华北财经会议，各解放区总结历史经验，建立联合办事处。接着，在石家庄召开财政金融贸易会议，确定货币比价。发行货币每人30斤粮食的流通量。12月1日，中国人民银行成立，发行人民币，北海币100元、晋察冀1000元、西北2000元兑换1元人民币。

2月8日，刘少奇讲，多种经济成分，领导市场要通过供销社用商业办法战胜资本家。

1948年6月，张闻天讲五种经济成分。在东北，由国营经济领导组织合作社，叫生产推进社。

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后，陈云估计物价要上涨20%~30%。

七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反映，农产品多了。陈云认为，不会多，有多少收多少。开城乡交流会，东西卖光了。

刘鸿生说：共产党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大定了。

调整工商业，先交所得税，后发股息。

侯德榜、李烛尘认为，公私合营问题不是出于自愿。毛主席批评巩固新民主主义。二中全会有个正确思想。后来，毛主席提出，搞社会主义，消灭资本家，创造进攻富农的条件，强调阶级斗争，提出总路线，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进入过渡时期。

一般讲，1949年到1957年基本正确。但这个时期思想路线就不一致。毛主席在二中全会有许多是正确的。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都搞改革开放？共同点是执行马克思主义过程中都没有找到一条路。讨论共同纲领时，毛主席不写社会主义。到北京接收，毛主席讲按原样原封不动接收，依靠工人阶级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手工业和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农民获得土地有积极性，合作社没有积极性。

戎子和：刘少奇研究农业，让薄一波研究新经济政策。刘澜涛批评了太行局的报告。毛主席认为太行是对的，华北局是错的。王潜写了一篇文章，同情太行。初级社是可以的，高级社就不对了。少奇讲，战争结束了，搞经济建设的坐第一排。新民主主义是长期的，发挥民族资产阶级优越性。

杜润生：原来有新民主主义阶段。毛主席说，新民主主义在桥上，但要过得时间很长，从现在起要十五年时间，1956年桥就拆了。

薄一波：1949年2月8日，刘少奇说：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的。新民主主义一般不破坏私有财产，社会主义首先在工业中破坏私有制（1951年）。搞社会主义还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资本主义剥削将有若干发展。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毛主席让我告刘少奇。

宋劭文：为什么新民主主义专政改为无产阶级专政？1953年以前毛主席的思想符合《共同纲领》。

薛暮桥：1962年，给刘少奇汇报工作。邓子恢说包产到户如何好，刘说可以开放。邓说安徽说是方向性错误，少奇说可以取消这个结论。陈云主张包产到户是从青浦调查开始的。老农说，不减产要同产量联系起来。

薄一波：刘少奇不是没有错误，在晋察冀相当“左”的，纠正得快。1949年到1957年要好好研究一下。

7月1日，开第二次座谈会。

段君毅：黄敬不同意农轻重。毛主席说：“你们不改重轻农，我

就要改为农轻重。”

大炼钢铁，冶金部提760万吨，财经委员会认为最高810万吨，毛主席定为1070万吨。4月提出，毛主席找大区谈，都说能完成，而且会超过。我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动员，毛主席同意，但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先提小洋群，陶鲁笳提小土群。天天给书记处汇报，都说行。

南宁会议以后，毛主席认为要放在不打仗的基础上，一、二机械工业部合并。后来又分开了。

黄敬主张一长制，刘少奇批驳他。我在华北局提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黄敬反对。毛主席问，校长负责制、一长制是哪个国家的？整理四个文件，交周总理送毛主席。搞工业七十条，邓小平主持讨论。毛主席未否定七十条，但当时有人反对。

积累率，陈伯达在天津说可达60%。

安志文：四十年没有搞好。一是毛主席一贯以阶级斗争为纲，二是如何搞好经济现在也未解决。

1946年抚顺会议后，林彪说东北问题严重。高岗、林彪担心刘少奇，高岗反对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周太和：1953年，财经会议开了73天。开始是税，后来变为两条路线斗争。陈云说：我不同意路线斗争。什么路线斗争？新税制出来仓促了一点，方法问题嘛。1953年冬出了高岗问题。轮流坐庄，军党问题。陈云向毛主席反映。军党论是高岗的还是林彪的思想？

7月8日，开第三次座谈会。

马洪：二中全会报告是马列主义文件。

1948年8月底9月上旬开东北城工会议。会议上争论城市是依靠国营经济还是私营经济，是依靠工人阶级还是依靠资本家？会议由王稼祥主持。由于土改“左”了，强调依靠私营经济资本家。提交东北局扩大会（林彪、罗荣桓不在）没通过。张闻天做了一个报告，说东北城市国营经济占90%以上。要依靠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但未说服不同意见。张起草阶级构成报告，高岗带到西柏坡，

毛、刘都看了。张闻天的报告来自列宁。

1948年11月中旬，林彪要进关召开东北局扩大会议，通过东北形势和任务的决议。决议认为，全东北解放后除帝国主义地主残余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东北过去的历史应作出总结。认为彭真管的一段是路线错误。委托高岗向毛主席请示。

毛主席说东北是方针问题。不是路线错误。

1948年6月，从内蒙古到东北局反对无组织无纪律。生产问题遇到合作社问题。土改后有两种办法：雇工；组织起来，提倡哪一种？组织人调查，1.7%的党员雇工经营。提出党员不雇工，提倡互助。据说毛称赞这个报告。7月，刘少奇、高岗到苏联。路过黑龙江作调查，刘不同意杨英杰的做法，说党员雇工不可怕。杨反映给高，高写报告给毛主席，毛批了很多话。

“三反”是东北开始的，毛主席提出在中央搞。“五反”是北京搞起来的，由吴晗建议。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报告，凯丰加了一段：趁机消灭资产阶级。送高岗看，高认为凯丰有独立见解。

薄一波：看到这个意见后，毛主席召开会议，说包括五毒俱全的人也不消灭。

马洪：后来高岗把报告收回。1951年底1952年初，高岗作报告，反对右倾思想。如何对待资产阶级；农村走什么道路。毛主席批很好，让乔木修改后发表。

第二次城市会议解决厂长负责制和党委制。开始是军代表制，后来改为厂长负责制。1950年3月党代表会议，文件由陈伯达修改。不久，刘少奇提出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大家不同意。中央批了文件。1953年，高岗代中央起草文件，仍主张厂长制。

杜润生：中国资本主义不成熟，社会主义如何走未解决。公有制为主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生产力标准是个什么样长期没解答。

我们来北京，毛主席找邓子恢谈话六次。开始主张合作化慢，太快了生产力要暴动，杀鸡宰猪，农民不积极。一次说现在是农民互相帮助解决困难。一次说个体积极性一定要保护。一次提出合作

社一要发、二要停、三要缩。不知什么原因出现高潮？说麦子长得好，合作社好，批评先机械化后合作化，我和邓子恢检查，他非常高兴。邓子恢回去后悔了，又去找毛，毛说你这个思想非用大炮轰不可。开会对我们大批判，形成高潮。刘少奇基本上是对的，认为农业国变工业国合作化才有基础。集体只能克服困难，不能发展。工业化和合作化的关系，刘少奇也有偏的地方。他们俩谁“左”说不清。开始刘“左”（可能指四清），毛克服“左”，他搞了走资派，更“左”了。

这次座谈会上发言的都是亲身经历这段历史的领导干部，实话实说，对我启发甚大。这些内容虽然不能写进经济史，但对历史问题心里有了一个底数。

调查研究是从1957年调查北京市第一机床厂和城市住宅开始。1962年，调查北京市顺义县九王庄大队；1964年，结合“四清”，调查北京市通县宋庄公社翟里大队二队和北京市第二机床厂；1969年，在“五七”干校调查石家庄市北宋公社东营大队；1981年，调查山东省国营企业改革；1986年，调查山西、陕西、河南的农村合作经济；1989年，调查广州、东莞、中山、顺德和佛山的外向型经济；1990年，调查北京市商业；1994年，调查安徽省农村改革；1996年，调查山东省济宁市国有大中型企业。

这些调查，不仅使我更深入地了解现实经济情况，也积累了历史经验。

专题写作，可以从1956年协助薛暮桥撰写《中国人民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算起。这本书的内容，写的实际上是国营经济产生和发展、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

1975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道路》，1980年修改为《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主要是讲农业合作化的历史。

1978年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我国城市住宅问题》，一本是《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两本书都涉及新中国的历史，尤其

是后者，已具有新中国经济史的雏形。

1994年，党的十四大以后，出版《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一书，这时，对新中国经济史有了进一步认识。

总之，40多年的经济学的研究生涯中，我涉及的方面很广，但没有打算专门研究某一领域，也不打算写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立志写一本新中国经济史，这些年我的研究工作都是为此作准备的。

二

《新中国经济史》不是一部纯学术著作，也不是一本政治教材。我选择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年轻的朋友们。打算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把这一段历史尽可能如实地告诉他们，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正确的，应当坚持下去；什么是错误的，不能再重蹈覆辙。

我一直做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没有研究过经济史，这是一个缺陷。但也有一点好处，可以根据个人的想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设计这本书的框架。

首先，绪论与一般经济史不同，不是从阐述全国解放前的经济结构和经济状况说起，而是写了新中国诞生的过程。内容包括：中国人寻求救国真理的艰苦历程；光明中国与黑暗中国的决战；新中国的蓝图三节。从这里可以了解，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历尽千辛万苦，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怎样经过反复比较，终于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我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而斗争的过程，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我们经过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赢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于

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光明中国与黑暗中国的决战部分，概述了抗战胜利以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的曲折过程。中国事变的发展比人们预料的要快。国民党政府迅速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所实行的变中国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内战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是与全国人民为敌的，是损害全国人民利益的，不能不遭到各阶层人民的反对。广大人民对美国和国民党失望了，于是寄希望于共产党的胜利，把共产党看作是民族解放的救星。全国人民拥护共产党，是因为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人民的利益，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共产党在政治上更加成熟了，对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由于有了充分准备和坚定的方针，我们就能排除各种干扰，粉碎国民党政府的种种阴谋，坚持将革命进行到底，迅速打败了蒋介石。1949年9月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以及国外华侨的代表。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的新中国的第一部宪章，它描绘了一幅切合中国国情和人民理想的新中国建设蓝图。这些问题，对于初学新中国经济史的读者来说，都是不能不了解的。

其次，新中国经济史从哪里写起？一般的多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开始，我则把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作为第一章。根据是，中国革命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开始，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为了减轻农民负担，我们必须根据自力更生的原则，依靠军队、干部自己动手，建立国营经济（当时也叫公营经济）。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国营工业和商业已经开始发展。抗日战争时期和第三次国内战争时期，在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指导下，解放区的国有经济有了比较大的发展。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国有经济，包括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金融业等各个部门，并逐步

成为一个体系。国有经济的发展，不仅保证了战争的供给，而且积累了经验，培养了财经干部。我国在全国解放以后，接收了许多大城市和数量巨大的官僚资本的银行、企业、矿山、交通、邮电，工作顺利，政策明确，迅速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和根据地、解放区二十多年财经工作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培养了大批通晓财经工作干部是分不开的。新中国经济史，理所当然地应当从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国有经济开篇。

第三，摆脱按年代顺序，突出重点问题，这包括：

建国初期的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工作。这是建国以后在财经工作方面采取的第一个重大措施。由于统一了财经工作，在市场上同投机资本多次较量，终于确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市场上的领导地位，制止了连续十二年的恶性通货膨胀。毛泽东评价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关于《论十大关系》。1956年，我国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开始进入大规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这一年二月，苏共召开了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做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在苏联国内和全世界引起了极大的震动。中共中央认真讨论了这个问题，明确表示，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领导时期苏联党和人民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历史，同时认为，揭开斯大林的盖子，对于各国共产党，包括我们党，破除对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解放教条主义绳索束缚的思想，努力寻求适合本国情况的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听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和湖北、广东两省以及武汉、广州市委的汇报，在1956年4月25日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这个报告，以苏联为鉴戒，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七年的经验，提出许多新的思路。1975年，邓小平在写给毛泽东的信里说：“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今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

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这个建议虽然经党的八大二次会

议通过，但并未执行。因此，有些经济史的书往往只提有这样一件事，建议是个什么样子，几乎无人论述。

我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在中国，真正由自己制定的国民经济计划，就只有这个建议。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是从1951年开始的，到1955年7月由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前后经历了五年时间，并五易其稿。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二是建立对农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初步基础和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发展虽然在1953年、1955年和1956年有过高和过低的波动，但由于调整及时，从总体上看，还是成功的，并且积累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以下四点经验：第一，应该根据需求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和财政的关系。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的基础上，周恩来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

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1955年下半年已经开始了）。党中央犯了“左”的错误。首先在社会上开展反右派斗争，继之则在党内批评反冒进，并且把二者联系起来。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并提出，使我国工业在15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最先进的水平。会议肯定了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反冒进的批评。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经济指标继续提高。提出两年超过英国，